


ZHEJIANG
FOLK
CUSTOM



浙江民俗大典

主编 顾希佳 副主编 朱秋枫 蒋水荣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FOLK
CUSTOM

浙江民俗大典

主编 顾希佳 副主编 朱秋枫 蒋水荣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民俗大典 / 顾希佳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308-18083-2

I. ①浙… II. ①顾… III. ①风俗习惯—浙江 IV. ①K89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8201 号

浙江民俗大典

主 编 顾希佳
副主编 朱秋枫 蒋水荣

责任编辑 叶 抒
责任校对 戴依依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3.75
字 数 1274 千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083-2
定 价 2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本书出版得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振兴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的平台建设与民俗学学科培育”重点资助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丁东澜 袁成毅 陈丹宇 郭持华 顾希佳

主 编 顾希佳

副主编 朱秋枫 蒋水荣

作 者

第一章：朱秋枫

第二章：顾希佳

第三章：袁 瑾

第四章：刘朝晖

第五章：唐宗龙

第六章：刘志军

第七章：钟伟今 朱 郭 沈月华

第八章：顾希佳

第九章：朱秋枫

第十章：雷阵鸣 钟发品

第十一章：蒋水荣

凡 例

一、本书通贯古今，明古详今，上限溯之发端，下限当代，大致以 2010 年为限，专记浙江全省各地的民俗事象。民俗事象经久稳定而又多变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记录或有详略。

二、本书采用当代民俗学常用的分类方法，设十一章。第一章概述，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分别为岁时节日、物质生产民俗、商贸民俗、消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人生礼仪、信仰民俗、文化娱乐民俗、畚族民俗、特殊人群民俗。全书结构大多成章、节、小节、目四级目录，以目为词条基本单位。有的章成三级目录，则以小节为词条基本单位，未求划一。

三、本书引用汉语古籍文句时，原则上都改作简体字和正体字；极少数容易引起混淆，或特殊需要者，酌情采用繁体字或异体字。少数方言俗字保留当地使用习惯，未作变动。

四、本书主要选收我省富有特点的民俗事象和活动，酌收部分与民俗关系密切的相关词条。部分词条内容难免多处互见，以一处为主叙述。本书所收民俗事象，采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学者的学术成果，难免在表述用词上有所不同，为尊重原始记录，收入时尽量不作改动。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一节 地理特征和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民俗史迹与历代民俗采录	3
第三节 浙江民俗的个性特征	15
第二章 岁时节日	22
第一节 年 节	22
第二节 春季节日	39
第三节 夏季节日	52
第四节 秋季节日	66
第五节 冬季节日	83
第六节 其他节日	88
第三章 物质生产民俗	99
第一节 稻作生产习俗	99
第二节 蚕桑生产习俗	115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习俗	128
第四节 林业生产习俗	141
第五节 渔业生产习俗	155
第六节 饲养与采集生产习俗	164
第四章 商贸民俗	171
第一节 商贸场所	171
第二节 商贸组织	185
第三节 商贸活动	192
第四节 商贸民俗	200
第五章 消费生活民俗	210
第一节 服 饰	210
第二节 饮 食	228
第三节 居 住	270

第四节 出行	287
第六章 社会民俗	306
第一节 家庭与家族	306
第二节 村镇	314
第三节 民间结社	343
第四节 交际礼仪	364
第七章 人生礼仪	371
第一节 生育	371
第二节 成年礼与生日、寿诞	379
第三节 婚姻	386
第四节 丧葬	461
第八章 信仰民俗	507
第一节 信仰对象	508
第二节 信仰媒介	551
第三节 祭祀仪式	554
第四节 占卜、巫术与禁忌	593
第九章 文化娱乐民俗	601
第一节 民间文学	601
第二节 戏曲曲艺	625
第三节 民间音乐舞蹈	656
第四节 民间美术	670
第五节 民间竞技游戏	685
第十章 畚族民俗	699
第一节 岁时节日	700
第二节 消费生活民俗	710
第三节 生产经贸民俗	728
第四节 人生礼仪	748
第五节 社会交际民俗	769
第六节 文化娱乐民俗	782
第七节 畚医畚药	791
第八节 民间信仰	793

第十一章 特殊人群民俗	804
第一节 堕 民	804
第二节 九姓渔民	838
第三节 小 姓	842
主要参考书目	846
后 记	851

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与人类历史发展并行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变革、民族交融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俗文化的辐射范围广，而其影响也深远。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提到：“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钟先生又说：“研究民俗文化，一是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民族文化的总体面貌及其历史和现状；二是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地去分辨传统文化的优劣，从而汲取和弘扬那些优秀部分，借以壮大、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一节 地理特征和历史沿革

浙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靠福建，西连江西、安徽，北接江苏及上海市。全省面积 10.55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74.63%，平坦地占 20.32%，水面占 5.05%，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大陆海岸线长 2200 多公里，有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岛屿 2878 个，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海岛 26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

浙江行政区共分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温州、绍兴、舟山、宁波、台州、丽水 11 个地级市。及至 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 5539 万人，其中畲族、回族、壮族、苗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约有 40 万人。少数民族中又以畲族人口为最多，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40%。

浙江地形西南高而东北低。山脉走向大致可分为三支。浙西北一支：从浙赣交界的怀玉山脉延伸入境，由白际山、天目山、千里岗山、龙门山等组成；浙中一支：从浙闽交界的武夷山脉延伸入境，由仙霞岭、大盘山、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等组成；浙东南一支：从浙闽边境的洞宫山脉延伸过来，由括苍山、雁荡山等组成。

地势和山脉走向也决定了浙江河流走向多自西南而流向东北，主要水系有钱塘江水系、甬江水系、椒江水系、苕溪水系、曹娥江水系、甬江水系、飞云江水系、鳌江水系等。这八大水系中，钱塘江水系流域最广，其源头在开化，上游衢江在兰溪与婺江汇合后称兰江，兰江与新安江在建德梅城汇合后称富春江，其下游则称钱塘江，全长 600 多公里。

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水系,其源头在浙江省第一高峰龙泉市黄茅尖所属的洞宫山脉,流经云和、丽水、青田、瓯海而注入温州湾,全长 376 公里。

与水系相关的湖泊和运河,主要有浙北的太湖、淳安的千岛湖、绍兴鉴湖、嘉兴南湖、鄞州东钱湖、德清下渚湖、嘉善汾湖、萧山湘湖、杭州西湖以及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南段)、杭甬运河等。

因山脉、水系、地层结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地貌,全省又可分为浙西南山地、浙东丘陵地、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盆地和沿海岛屿六个地形区块。浙江农业人口大都集中在平原和盆地上,除金衢盆地面积较大外,小区域的盆地尚有诸暨盆地、永康盆地、浦江盆地、新嵊盆地、天台盆地等。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平原盆地区土质肥沃。农业经济可分为平原经济、山地经济和沿海经济三大类型。平原经济以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为主,这一带河网密布,盛产稻米、桑蚕、棉麻和淡水鱼,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山地经济以林业、茶叶、水果为主,杉木、毛竹、油茶等经济林木发展尤为突出。沿海(包括岛屿)经济以海洋捕捞、海涂养殖为主。舟山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其中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鱼类产量为全国第一。重工业以电力、建材、冶金、制造等产业为主。轻工业较为发达,包括丝绸、纺织、陶瓷、造纸、制盐、家电、服装等产业。近年来,服务业譬如餐饮、旅游、文娱等,都有较大发展。

浙江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较中原为晚,一般认为在春秋时期吴、越建国前,这里是“文身断发、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被中原人称为“蛮夷”“百越”。1974 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馆的专家在建德的乌龟洞中发现了浙江的第一枚远古人类的大齿化石,被命名为“建德人”,其生活年代距今 10 万年左右。本世纪初对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约 9000~11000 年以前的栽培稻稻壳和石磨盘、石磨棒以及夹炭红衣陶器等生活器皿,这更是将一万年以前人们生活的实况,展示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距今 8000~10000 年前的诸多夹炭红衣陶器和覆盖棚蓬建筑的食物储藏坑的发现;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 7000~8000 年前的房址、窖藏、灰坑、独木舟的发现,填补了余姚河姆渡文化以前的某些空白,构成了上山文化、小黄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这样一条浙江史前文化的历史长河。其中,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骨耜、稻壳、炭化谷粒、骨哨、骨玉雕、彩陶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玉琮、玉璧以及古城基、水埠、独木舟的发现,可以大致勾勒出春秋以前的历史轮廓和居民生活概貌。

春秋时期,越王允常建都于埤中(今诸暨城北会稽山南麓),号称越国。那时吴越两国大致以钱塘江为界,南为越,北为吴。两国同族、同语、同俗,史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卷八记载勾践自述之语,称越国当时是“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悦兵任死”。当时除农业和渔猎业外,越国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如冶铜、制陶、纺织、酿酒等。

秦统一中国后,在南方首先设立会稽郡,在浙江境内共设置了 19 个县级行政区。秦始皇第五次南巡曾上会稽山立《会稽刻石》,并祭大禹以正风化。始皇巡越,还留下诸如秦始皇赶山、望海等许多传说。

两汉时期,郡县制已经稳固,至东汉末年,在今浙江境内已立 22 县。当时的吏治日趋严明,一度名宦名士辈出,如太守张霸、朱买臣、马臻,名士王充、赵晔、嵇康等,都颇有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浙江一带却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所发展。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及南朝时期,北方许多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南迁,这不仅造成了当时浙地人口的骤增,同时也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融,特别在民俗方面,受中原民俗的影响也日趋深远,如寺院佛塔的广建,佛教的盛行,丧葬习俗中的风水意识,节日习俗的增多,服饰、语言的融合等。

隋唐两宋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浙江开始成为当时封建王朝重要的物资供应地。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和唐代嘉兴宅田、雀母庙粮仓的建成,都印证了“苏杭熟,天下足”这一古谚。隋代杭州城的始建和唐宋二朝诸多文人名宦如李泌、白居易、韩滉、郑虔、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的仕浙,也为浙江吏治的规范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当时,浙江的海塘、水利、城池、街巷、书院等建设都具有一定规模,节日习俗、婚嫁礼仪、文娱百艺等日趋完善,特别是吴越国和南宋年间,民俗风尚表现得尤为活跃。

元明清时期,浙江民俗基本定型。清代近三百年间,虽有男子发型与男女服饰上的变更,但居住饮食、婚丧礼仪、节日习俗等基本民俗均无大变。及至辛亥革命前后,海内外仁人志士立志革新,戒鸦片、废裹足、剪辫子、斥八股。各地学堂和民众教育馆的开办,都为新文化的推进和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营造了一定的声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风俗习惯一度趋于淡化,新的风俗逐渐萌生发展,如新式结婚用秧歌锣鼓队迎接仅戴大红花的新娘;改造旧庙会为物资交流会;逐步推行火葬等。又由于通过严禁赌博、嫖娼、溺女婴、典妻、吸食鸦片和取缔邪教性质的道会门等措施,社会风气发生较大变化。“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一些传统的良风美俗,曾被视为“四旧”而遭排斥。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良风美俗逐步得到恢复,同时又融入了一些外来民俗,如圣诞节、情人节、旅游结婚、集体婚礼、买合法彩票等。住房装饰、饮食品类、衣着服饰也逐渐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

第二节 民俗史迹与历代民俗采录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旅游之地”的美称,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化根基深厚,源远流长。就民俗文化而言,举凡岁时节日民俗、生产商贸民俗、社会民俗、礼仪信仰民俗和娱乐民俗,都有其久远的传承。以人类最为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来说,通过对考古出土文物的科学论证,可以探究这一带的民俗肇始轨迹。

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纺轮、木制纺轮、石制纺轮、定经杆、绞纱棒、机刀、布轴等纺织工具看,近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超越了用树叶兽皮遮身的蛮荒生活,其智慧也已达到使植物纤维经纬交织而成布匹这样一种近乎文明人的高度。考古学家根据上述发现,认定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踞织机。同时,考古学家

对遗址出土的 33 件貉下颌骨标本进行检测时,发现有明显的切割痕,因而推断出是河姆渡人剥取貉皮时留下的。彼时取兽皮缝衣御寒,也是一种近乎文明人的行为。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仅发现留在陶、骨器上的“蚕纹”图案而未见丝织品残留物,但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则出土了用家蚕丝织成的绸片。经显微镜观察,这种绸片的经纬丝由多根茧丝合成,并利用蚕丝固有的黏着力黏合成绸匹。这一发现,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

古越大地的先民们使用葛布、麻布、丝绸并兼以羽毛、兽皮制成衣服,在世界性“衣俗”的形成过程中,无疑走在了前列。

本世纪初在对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经人类选择过的早期栽培稻稻壳和储藏坚果或块根类植物的深土坑。在对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制作原始的夹灰红衣陶和为数众多的盆、钵、盘、罐、釜等陶器。特别是浦江上山文化遗址中打磨光洁的石铤、石斧、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出土,更说明一万多年前,上山人已经具有碾谷磨粉的技能,从种植、采集到储藏、研磨,原始的饮食民俗已经基本形成。

河姆渡文化时期,不仅稻米已经较为充裕,其他食物如猪、牛、狗等牲畜肉,鹿、象、獐等兽肉,鱼、龟、鳖等水产以及禽类、蛋类、果实、野菜等,也都不难获取。河姆渡文化遗址大量陶制炊具如釜、甑、灶、盆、钵、鼎的出土,更说明河姆渡人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特别是陶制支釜架和陶灶的出现,反映出他们已经懂得调节烧火点与釜底的合适距离以及通风助烧的道理。

最令世人惊叹的是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与陶釜一起使用的陶甑。陶甑呈盆形,平底上有许多蜂窝状圆孔,以便釜内的蒸气通入甑内。甑上加盖,其原理与现今的蒸笼相同。现代人知道,利用高压蒸煮,更容易将食物煮烂并保持原味。这些道理,河姆渡人也已经知道并运用到他们的饮食习俗中去了。

良渚文化时期,由于具备靠山、沿河、濒海和田畈辽阔等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社会分工和城池的初步形成,人们的生活开始出现质的变化。从出土的农耕生产工具看,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稻米已成主食。另外如芝麻、蚕豆、花生、甜瓜等作物的种植也很普遍。这些遗存物的发现,改写了原以为花生、芝麻、蚕豆是汉代以后从国外传入的中国农作物史。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时期先民的饮食习俗,已经接近中华文明的起点。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一万年前的“建德人”是“穴居”的;但到近一万年左右前的浦江“上山人”,已经有“屋居”的遗址出现了,那里发现了布局较为整齐的干栏式、沟槽式房基和近方形的灰坑。可以得到印证的是嵊州小黄山遗址、嘉兴马家浜遗址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长方形房基的遗迹。我们的祖先在浙中、浙西北丘陵地带铺石为基、插木为柱、结柱为屋的居住形式,在当时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考古工作者在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地桩、地龙骨、板桩、圆木桩、木板、木梁以及用榫头、卯口连接起来的草(泥)木屋形式,这是河姆渡人根据水网区地势低洼、潮湿的特点而营建的一种颇为完善的居住空间,也是对干栏式屋建最完美的诠释。其中民俗意蕴最高的有三点:(1)干栏式排屋背东北而面西南或背西面东的建屋朝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说是“俗成万古”。(2)干栏式排屋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有三幢以上的

规模,这种居住密集型状态,说明当时是聚族而居。这种“聚族而居”的习俗,也一直延续到近代。(3)干栏式排屋下层畜猪养牛,上层住人,这种居住形式和习俗,在沿海地势偏低地区的农村,至今仍能找到。由先人创造并形成的习俗,延续了千秋万代。

200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离地面3~4米处,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独木舟。无独有偶,2010年12月,在杭州临平茅山遗址的古河道中,也发现了一艘属于良渚文化时期(4000年以前)的独木舟。舟头尖尾方,全长7.35米,最宽处0.45米,船舱深约0.23米,较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略大。这两艘独木舟的打造年限,比南非发现的被认为世界最早(约2000年前)的独木舟,还要早2000年甚至6000年。

在出土文物丰富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虽然没有发现独木舟,但出土了一为半月形一为梭形的两件陶舟,这说明河姆渡人见过独木舟的形体,或是根据自己打造的“舟”而塑成“陶舟”加以自我欣赏。及至良渚文化前后时期,发现船、桨的遗址就更多了,如桐乡罗家角泥层中发现过独木舟的遗迹;湖州钱山漾文化遗址出土过一支长叶短柄的划桨;杭州水田畝遗址的泥层中,也曾出土四支划桨。种种出土文物证明,四五千年以前,舟楫用于水上交通和捕捞作业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据专家推测,先民们在用火烧烤、用骨石挖凿船舱的过程中,还将巨木的一头或两头砍尖,并略向上翘,其作用皆为减少行驶中的阻力和免使浪花扑进船头。这种构想与现代人的造船原理极其相似,足见先民的智商之高。

临平茅山遗址独木舟的发现,解开了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遗址设有几处水门的疑团。显然,古城水门不仅是通水的需要,而且也为舟楫开了方便之门。可以想见,当时古城外缘的河道上,独木舟已经不是少数的了。

从上述史前先民的衣、食、住、行生活状况来看,他们凭借集约力量从事建房、造船、渔猎等社会民俗活动已开始形成。从出土的史前文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精神生活和精神民俗方面的一些表现与追求。

神灵崇拜是先民们对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的敬畏和不解而逐渐形成的传统民俗。祖先崇拜也是先民们对人类的生命延续感到神秘而产生的一种敬重并逐渐形成的仪式。小黄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件“石雕人首”像,诸暨楼家桥文化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件“人头雕塑”。一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先民们的自我塑造;二是给想象中的神灵或祖先造像。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昇日”象牙雕,从直观角度看,它反映了河姆渡人崇日崇鸟的普遍民俗心理。但纵观世界性的考古研究并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双鸟昇日”图案的主要含义是显示河姆渡人对太阳的崇拜。《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踆鸟。”《淮南子·精神训》也说:“日中有乌而月中有蟾蜍。”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并且出土于成都金沙乡的“太阳神鸟金箔”,四鸟绕日,中心是太阳。“太阳神鸟金箔”虽是秦汉时巴蜀人所打造的,但这种构思肯定有着更为久远的传说作依据。据考证,英国英格兰南部坡地上的“巨石阵”,也是先民们“迎日”敬日神的一种神圣建筑。民俗学家姜彬先生认为:“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对太阳的崇拜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这是因为稻谷生产在这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太阳与稻谷生长的关系已被人们深深地感受到,对太阳的崇拜也就油然而生。”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足以证明信奉神灵的祭台。但延至良渚文化时期,在高土台型墓地中就发现了多座祭台,学者一般认为其是祭天地神灵和祖先的场所。对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琮、玉璧的确切含义和用途,学者多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于精刻于玉琮面的通常被称为“神人兽面像”的图像解释,各有不同,一般认为它既是太阳神图像,又是良渚人的族徽。姜彬在《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中说:“良渚时期要比河姆渡时期晚二三千年,这时期的鸟、日信仰会有不少的发展和演变,从这个历史背景上考察良渚文化时期广泛出现的‘神人兽面像’,很可能是一个太阳神的图像,也就是说太阳神是良渚人的族徽,良渚人是以太阳为图腾的部族。”“至于所谓‘兽面’,其实也不是兽面,从它的圆而硕大的两眼看来,可能是太阳的象征,是一种太阳的拟人化。”也就是说,在当时良渚人看来,太阳已经从自然景物上升为具有人形的“神人”了。

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讨论还在进行中。目前较审慎的观点是:“兽面纹玉琮内圆外方,以四角为中线,对称阴刻有兽面纹,线条纤细,琢制精良。玉璧与玉琮照《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说明良渚文化中的玉璧、玉琮原先应是祭祀用的礼器,这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文物》图版说明)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不但以玉璧敬天神,以玉琮礼地神,而且已出现神灵更为广泛的原始宗教。

丧葬形式是史前民俗研究的重要一环。考古工作者曾在小黄山文化遗址发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座,并有夹灰红衣陶圈足盆、罐随葬品各一件,这说明那时的先民们已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并仍然会享用盆、罐储存的食物。河姆渡、马家浜文化遗址墓葬中,也都发现过陶制豆、釜、鼎、钵、杯等储器和食器。至良渚文化时期,由于大量墓葬和成片墓葬坑的发现,彼时先民们的丧葬习俗,才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主要特点有:(1)墓地形态有高土台型和平地型之分,前者多为部族首领或有较高身份者,后者一般为平民。(2)入葬形态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双人合葬,但合葬者多为殉葬人。(3)墓葬中一般都置有陶器、玉器,贵族墓葬中尤为丰富,随葬有玉璧、玉琮、玉钺等礼器。(4)从墓葬的不同区域、不同规格以及人殉情况看,当时族内的等级观念和部族间的战争活动已十分明显。

艺术创造和审美心理,也是精神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灰陶片表面的稻壳印痕,可能是先民们在稻秸上晾晒土坯时无意中粘连上去的。但小黄山遗址出土的夹砂灰陶钵、陶豆上的绳印纹,则显然是先民们有意印制上去的一种“美饰”。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双鸟昇日”“鸟形匕”以及“猪纹陶钵”等佩饰和器皿,已经是一种相当精致的艺术品。特别是“木胎红漆碗”的发现,更说明河姆渡人不仅有制造彩色鲜艳的生活用品的才能,更反映出他们的审美心理。

爱美之心,不仅表现在器皿的形状、彩色、图案等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先民们的饰物方面。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饰物玉珮和玉串,其制作之精良,已远远胜过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挂饰和彩石珠、璜等饰品了。

自从有了文字,许多古代民俗就有可能被先人们记录在文献典籍上。追溯这种历史,我们可以从春秋时代的有关著述说起。

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吴语》云:“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问焉,曰:‘吴国为不

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无以行之。”这是较早记述越地建有“社稷宗庙”以崇神崇祖并用“血食”进行祭祀的一段文献,同时联系到当时越国“车马兵甲卒伍”这一系列的军事组织和装备。该书还提到当时有“斩有罪者以徇”和不听从号令者“身斩”及“妻子鬻”等军事习俗。

《国语·越语》篇中还有当时居住民俗的一些记载:“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吴越之民“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这些都是这一带水上居俗的最早记载。《越语》篇中还提到“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以及生子女赏酒肉的生育习俗。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是浙江最早的地方志,书中不仅有当时筑城、冶炼、造船、制盐、畜鹿、畜猪、畜鸡等物质民俗的记载,还有歌舞美术等精神民俗的记载。如“乃饰美女西施、郑旦……献之于吴王”“作为策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献之于吴”。祭祀民俗方面,该书还提到:“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祠”,可见当时在这一带立庙立祠已相当普遍。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则将《国语》《越绝书》概述的古越民俗,描绘得更加具体生动,特别是此书关于大禹在越地得治水金简玉书,娶涂山女娇,杀防风氏,死葬会稽山等传说的描述,对后世影响甚大。书中有关欧冶子铸剑的传说,木客山一夜生一双神木的传说、越处女与袁公比剑术的传说等,也都记之甚详。该书记潮神传说比《越绝书》所记伍子胥死后成“水仙”的传说更加丰富并有所发展,文云:“(文种)葬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传承至今,钱塘江出海口一带民间仍有“前潮神”和“后潮神”的传说广为流传。

《吴越春秋》中追记的几首越地古歌,如《弹歌》《采葛妇人歌》《越王夫人歌》《军士离别词》等,是越地民间歌谣的先声和宝贵财富。其中比《越绝书》所记更全的《渔父歌》,对后世船歌、渔歌的创作流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借鉴作用。

东汉王充《论衡》,除记述最早流传于越地的《击壤歌》原词外,还提到周成王时“越尝献雉于周公”的史事和汉孝平元始元年,越君“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的史事,反映出当时越地君民视雉为“宝物”的民俗心理。该书《讥日篇》中,还对当时的丧葬、祭祀、沐浴、裁衣、盖屋等习俗,作了详细的论述。作者还在自传式的《自纪篇》中,提到他“八岁出于书馆”“辞师受《论语》《尚书》”等民间子弟进书馆读圣贤之书的习俗。特别是提到小时候与同辈伙伴们相处时,“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等情节,尤为生动。该书所记“闾巷之乐,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等民间音乐和普通祭祖活动的情形,也很具体。

东汉末年,应劭在他所著的《风俗通义》中,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民间风俗,作了系统的记述。该书卷九中则提到“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这对当时这一带的民间信仰作了生动描述。

晋代迁居嘉兴的学者干宝在他所著的《搜神记》中,通过志怪小说的形式,侧面记述了当时吴兴、会稽、东阳、临海等郡县的诸多民俗事象。如采自吴兴的《戴洋复生》《吴兴老狐》,采自嘉兴的《城陷为湖》《倪家怪魅》,采自会稽的《严卿禳灾》《杨度遇鬼》,采自余杭的《河伯招婿》,采自余姚的《鬼扮虞定国》,采自富阳的《蚁王报恩》,采自松阳的《柳荣

与张悌》等篇，对当时这一带民间信奉神祇，敬畏狐仙鬼怪以及相关的民情民俗，都有详细描述。如在《河伯招婿》篇中，除简述了当时婚嫁礼仪外，还提到古代的三卷医方，即“脉经”“汤方”“丸方”，极具医俗色彩。《女化蚕》传说，不仅充实了三国时张俨撰《太古蚕马记》的故事情节，而且还对后世蚕俗的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由中原迁入越地的大姓氏族、文人学士们不仅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发展，而且还带来了原先盛行于中原一带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节俗的内容。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绘的三月三日上巳节“修禊事”和“流觞曲水”的盛事，影响深远。另如南朝东阳无疑《齐谐记》中记述的正月十五日“杨枝插门”以“迎紫姑”习俗；安吉人吴均《续齐谐记》中记述的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酒”以避祸的习俗等，都颇具民俗史的研究价值。

隋唐时代，浙江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许多名臣和著名诗人，曾先后来浙江任职或游历，因而将当时浙地的种种民俗事象，写入他们的诗篇之中。特别是曾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对杭州山水美景、民俗风情的描述尤为生动。如《余杭形胜》：“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杭州春望》：“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正月十五夜月》：“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忆江南》：“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答客问杭州》：“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等诗句，每每勾勒出一幅幅当时杭城的风情画。杜甫、李白等的浙地游历诗，也广泛涉及当时两浙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杜甫《壮游》：“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李白《采莲曲》：“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李绅《禹庙》：“清庙万年长血食，始知明德与天齐”；赵嘏《题曹娥庙》：“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等。当时两浙农村中男耕女织、舂米焙茶的景象，也往往在唐诗中有着生动的反映，如孟郊《织妇辞》：“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许浑（曾任睦州刺史）《村舍》：“移蔬通远水，收果待繁霜。野碓春杭滑，山厨焙茗香”。更有赞扬物产的诗篇，如皮日休《茶瓯》：“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将当时的薄胎瓷茶具赞美到了极点。顾况《剡纸歌》：“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对剡纸（也称“越纸”）的品质赞叹不已。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将越地秘色瓷酒具之美与饮酒之俗，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篇赞美物产和酒俗的好诗。

五代时，吴越王钱鏐据东南十四州，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发展农桑商贸，因而钱氏统治时的吴越国民生安定，财力充足，四方文士僧侣云集。在新旧《五代史》《钱氏家乘》《吴越备史》等一系列文献中，有许多当时浙地的民俗事象被记录下来。除杭州“腰鼓城”“捍海塘”，诸多佛寺的修建，与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海路贸易的开通等重大事件外，对当时的衣食住行、节俗文娱及婚丧礼仪等，也都有记述。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述钱鏐衣锦还乡时的情景，反映出当时的乡情礼仪和一些普遍的民俗心理现象，如祭祖坟，访故老，用银、金、玉三种不同材质的酒杯敬长寿者，亲口唱《还乡歌》娱宾等。在两首不同语音、风格的《还乡歌》中，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民俗意愿，如“斗牛光起今天无欺”一句，即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越地区的地理位置在“斗牛”二星的星野之内。钱鏐也自认为王业的告成是上天所赐（“天无欺”）。第二首山歌体的《还乡歌》，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吴语的语音和韵味。歌中称“我”为“我侬”，这与今天杭嘉湖地区吴语的自我称呼完全一样。